

## 前言\_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與勞動

### ◎勞動力過剩的原因

數位革命從三方面改變了工作。第一是透過自動化。新技術取代了（從職員到焊工工等）各種勞工，未來還會取代更多人（從司機到律師助理）。機器變得更靈巧，軟體更聰明，這些進步使得人類愈來愈多的工作可以低價地進行自動化。

同時間，數位革命強化了第二股力量：全球化。如果沒有強大的資訊科技，過去二十年富裕的西方企業幾乎不可能管理龐大的全球供應鏈。即使沒有蘋果這類公司將生產線散布到全球，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可能也會更加融入世界經濟，但這樣的成長會緩慢許多，平淡許多。

事實是過去一個世代裡，全球增加超過十億個就業機會，多數都發生在新興經濟體。整體而言，在那些地方的勞工擁有的技能低於富裕世界，中等技能的製造工或後勤辦公職員會比白領專業人士更深刻感受到融入全球經濟。但這種情況將來未必不會改變；開發中國家有幾百萬優秀的工程師、醫師、財務專業人員等等，服務客戶的能力較諸歐美同儕絲毫不遜色。

第三，技術的進步讓一些高技能勞工的生產力大幅提升，能夠勝任過去需要更多人員才能完成的工作。小小的財務管理團隊因而能掌管龐大的基金；高技能的講師能設計課程，供數百萬學生一次又一次地學習，也就可能取代成千成百的講師。新的技術讓更少的醫護人員能觀察和治療更多的病患，更少的律師可以研究更多與審判相關的證據，更少的研究人員可以篩檢大量的資料，更快速測試更多的假設。

這三大趨勢——自動化、全球化和少數高技能勞工的生產力提高——聯合起來產生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人力資源過於豐富。因不知如何消化準備投入工作的人海（數量堪稱前所未有），全球經濟正逐漸失靈，情況讓人憂心。工作制度是除了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但原本的許多重要功能現在都已無法發揮——例如生活的安排、購買力的分配、社會凝聚力的強化等等（社會凝聚力是人們感覺對社會能有正面貢獻時所培養出來的）。

### ◎管理勞力過剩的難題

當一個人說，有太多人要做社會需要做的工作，其實是受到「勞動總合謬誤」(lump of labour fallacy) 影響：亦即認為工作就這麼多，總合是固定的。這個觀點促成一些政策的制定，例如降低退休年齡，以便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工作。如果我們相信這個基本理論，那麼我們當然應該擔憂機器的崛起。

但經濟學家通常認為經濟的運作方式很不一樣。他們有時會提到十八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賽伊（Jean-Baptiste Say）的「賽伊法則」（Say's Law），通常簡述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此，當較年長的勞工在職場待更久，便會賺更多錢，花錢時就會創造出對其他產品與服務的需求，造就支持那些產品與服務的工作。就節省勞力的技術改變而論，經濟學家相信，當一個人因機器而丟掉工作，結果便會促成某個人得以節省資源——可能是公司的老闆或享受更低價格的消費者。這又會讓他們有較多錢可以花在別的地方，這些支出應該會為那些被取代的勞工創造就業。

這套理論認為，之所以會發生此神奇的重分配（reallocation），是因為彈性的價格和薪資發揮了絕佳的效果。一個失業者在找工作時就像商人要銷售產品。如果商人的產品賣不出去，代表價格太高。這時他有兩個選擇：他可以改善產品的品質或降低價格。

想想十九世紀紡織品的手工生產者：一個具備些許技能的勞工，收入還不錯，直到出現工廠與他競爭。假設此勞工做為自雇工匠一週賺三美元。然後工廠來了，以一·五美元的週薪雇用無技能的勞工，可以大量生產布匹。工匠繼續嘗試銷售他的產品一陣子，但最後放棄了。大量生產的布匹太便宜，他的售價較高，無法賣出足夠的數量來養活自己。他只好認命到工廠去，向經理自薦勞務，一週三美元。經理聽了當然會笑出來，請他回去。那個勞工會踏著沉重的腳步失望而歸，一個因新技術而失業的受害者。

也許那個勞工之後便稍微懶散，若是在現代就是白天在家看電視，同時一心希望工廠被隕石擊中。等他錢用完了，他去別家工廠看看是否剛好需要他這種技能而願意一週付三美元。但一個人必須是積極想要找工作而找不到才叫失業，如果他真的有興趣找工作，終究會明白該怎麼做。他到各家工廠時會注意到有些工廠在徵工程師維護設備，一週五美元。然後他可以投資時間與資源學習技能，以便應徵那份工作，或者他可以接受一·五美元的週薪，找一份無技能的作業員工作。

經濟學家不相信存在勞動總合的問題——這個觀念認為任何經濟體裡只有固定數量的工作。但他們確實承認，當個別勞工被新技術取代時會承受嚴重的衝擊。這個勞工有兩個選擇：學著靠較低的薪資過活，或想辦法學到更有價值的技能。

當然，是否能輕鬆完成轉型，與多少人嘗試立即開始適應很有關係。重新訓練幾百名勞工會比幾百萬名勞工更容易。聘雇要花時間，當每個工作機會的應徵人數大增，雇主就可以精挑細選。到最後會有公司想到聰明的新方法來運用這龐大的低度就業勞工（under-employed workers），因為便宜的勞工就是生產機會，但這個過程可能耗費很長的時間。

整個過程中，我們會愈來愈有能力運用技術性的解決方案，完成過去一直仰賴人力的工作。而且這個能力會不斷成長。

我們已經看到，過去一代裡全球勞動力成長超過十億人，未來一個世代將再增添將近十億。同時，拜新技術之賜，工廠、倉庫與商店裡的簡單工作會更容易自動化，而這些工作過去一直占全球就業人口很大的比例。技術也會改變教育、醫藥等領域，讓少數教師或醫師可以勝任以前很多人員才能做到的事。

經濟與社會自然會試著調適。調適意味著很多勞工的薪資會停滯，貧富不均的現象會惡化，還有很多人與職場的連結會變得很脆弱，甚至逐漸消失。勞工面對這些問題不太可能逆來順受。總有某些方面必須讓步。也許社會將找到方法改善工作或發展出替代方法，或者勞工會利用政治制度來削減那些讓他們的世界天翻地覆的力量。

### ◎追求繁榮的政治挑戰

對人類而言這應該是一個正面的挑戰。如果存在所謂的勞力過剩現象，理論上應該是導因於技術的進步，這表示我們將不再需要為了存活而辛勤工作。如果在一種制度下人們會積極尋求他們非常不想要做的工作——好比擔任客服人員處理不滿意的顧客抱怨，或是在酷熱的倉庫搬運包裹——這不應該是社會致力要保存的制度，除非是技術上不得不如此。如果社會可以找到方法將這些不愉快的工作自動化，或將工作分攤得更廣泛，讓個別勞工花更少的時間從事辛苦不愉快的工作，這當然代表人類的進步。

對於勞動力多到不知如何運用的現代經濟體，技術的富足創造了這種進步的可能性。就像發現大量的金礦或石油，強大的數位新技術可能帶來龐大的財富：不需要社會上每個人都工作就可以實現。然後我們或許會覺得烏托邦就等在不遠的未來〔如同最近一些書籍所主張的，如梅森（Paul Mason）所寫的《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唯一要處理的問題是花在勞力工作的時間減少得太緩慢，以及高生產力的技術所產生的共同財富應如何分配給整個社會。

但這個工作更美好的世界是可以實現的嗎？幾個世代的學者都在想像這個世界。一九三〇年，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寫了一篇文章，敘述他如何看待未來的經濟發展。當時全世界陷入深度蕭條。凱因斯在那篇〈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開頭指出：「此刻我們正承受經濟悲觀主義的嚴重襲擊。」

但他在文中邀請讀者將目光超越短程的困難，看到人類正投入了不起的長期成長與進步。經過數千年的漫長勞動——期間人類生活水準的成長緩慢到幾乎無法察覺——西北歐在經濟大蕭條之前的兩三百年裡，與過去的經濟產生清楚強烈的差異。主要拜技術進步之賜，這些社會得以享受財富的驚人增幅。儘管有大蕭條的陰影，凱因斯看不到有什麼跡象顯示背後的技術進步已經慢慢停止——而且他是對的。

凱因斯相信，這世界一旦走出大蕭條，便會恢復成長，生活水準會回到先前向上的軌跡。他承認快速的技術進步會造成短期的不安（「暫時適應不良期」），但鼓勵讀者不要忽略了整體局勢：

這一切表示，長期而言人類一直在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我預測一百年後，進步國家的生活水準會是今日的四到八倍。即使以現有的知識來看這也絲毫不值得驚訝，我們甚至可以想像進步的幅度比這個大許多，這絕非妄想。

他省思這樣的進步，認定如此可讓人類從滿足基本需求的煩惱釋放出來。工作時間可以縮減到也許一週十五小時，然後減到零。人類要面對的主要問題就只剩下在休閒時間太多的世界裡如何自處。

凱因斯關於生活水準的進步預測證明是正確的。如同他所預測的，依生活費用調整後的每人收入有很大的成長；富裕經濟體在生活水準上已有四倍以上的進步。看起來可能至少會有一些人到二〇三〇年會享受到八倍的成長。那麼富足的社會在哪裡？輕鬆的生活在哪裡？哪裡有人一週工作十五小時？

事實是他對人類經濟問題的描述並不完整。凱因斯擔憂在技術繁榮的時代人們會太無聊；卻沒有操心可能會有政治因素讓這個時代永遠不會到來。隨著時間過去，全球經濟持續成長，我們已可清楚看到，找尋烏托邦的最大困難不在於知道如何生產更多。這一點我們已經做到了，困難的是如何重新分配。

我們沒有做到的是將生產果實平均分配，平均到可以廣泛縮減工時，因為這在政治上非常困難。要讓工作與重新分配維持可持久的平衡極度困難。因為有錢有勢者不願意補助窮人，窮人則可能會認定，富人所提供的重分配會造成貧富之間極嚴重、甚至不公平的收入差距。窮人可能也不會滿足於這樣一個讓他們實質上失去作用、由政府藉由救濟以維持和平的經濟制度。如果重分配處理得太拙劣，聰明或有抱負的人可能便喪失努力工作改善經濟的誘因，導致成長停滯，社會剩餘（**social surplus**）太少，不足以讓社會上所有的成員享受生活水準的提升。

凱因斯應該也可以預見這些困難；在他的時代，他對政治情勢的觀察足夠敏銳。到一九三〇年代，世界正蒙受「經濟悲觀主義的嚴重襲擊」，歐洲陷入爭奪工業經濟利

益的激烈階級衝突已超過一世紀：在一百五十年間，勞工的動亂或革命的威脅一直讓精英階層憂心忡忡。但時代的進步似乎站在受薪勞工這一邊，勞工一次又一次主張權利並贏得勝利：包括爭取到組織工會權，投票權擴及無財產的男性以及（最終）擴及女性，建立勞工取向與社會主義的政黨。到二次大戰結束時，勞工對雇主的戰爭幾乎完全勝利。共產帝國在東歐與亞洲各地擴大勢力範圍，同時在戰後的西方，政府似乎也愈來愈強大，將大半經濟領域納入管理，以高稅率壓制富人，提供愈來愈周全而慷慨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但其後政治風向改變了。共產主義證明是管理經濟的低劣方法。技術的進步與貿易的發展慢慢腐蝕工會的勢力。戰後數十年的繁榮造就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教育程度更好，白領更多——這些人愈來愈不同情左派勞工黨所重視的價值。一九六〇年代，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之類知識份子漸漸大聲呼籲採取不同的、更市場取向的經濟類型。其後因戰後前所未有的經濟榮景畫下句點，加上七〇年代的成長幅度讓人失望，又有高通膨的問題，終於製造出政治劇變的條件。

某些國家改變的情況比較徹底。在英語系國家——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等——富人的稅負降低，國家讓經濟自由化並解除管制，勞工組織的勢力急遽縮減。在北歐國家，政府大力推動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但維持強大的福利制度，並以稅捐來支撐。歐陸國家如法國和德國規劃中間路線：經濟走向自由化，有些地方刪減福利制度，但也保留比英美更偏重干預主義和重分配的制度。

早在目前正值工作年齡的多數人出生時，這個改變已經開始。我們繼承的工作觀反映此漫長的鬥爭，亦即認同工作是好的：於經濟上不可或缺，於道德上也是有益的。我們明白，當工作能發揮效益時，便能提供社會秩序的穩定基礎。工作讓人們有事可做，讓勞工感覺他們對社會與家庭的福祉有貢獻。多數人認可透過工作來分配收入是資源分配的合理基礎（雖則未必每個人都認為公平）。工作能鼓勵人追求他們相對比較在行的事情並發展那些技能。工作是維持世界「運轉」的動力。

但在過去一代裡，可以明顯看出歷史並未劃下句點；爭奪經濟成長利益的政治鬥爭還未結束。過去幾十年來形成了自由化的共識並促成改變，同時，技術的進步與全球經濟的整合過程也改變了典型勞工的經濟角色。社會雖有潛力創造繁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社會的進步，目前的社會結構所能提供的繁榮與實現潛力之間還有一段落差。新的政治劇變隱然成形。

社會若要創造改變以吸收過剩的勞力，意味著將重啟歷史的戰爭。這一次將是觀念的戰爭——一邊是新的觀念，一邊是從歷史的垃圾桶裡找回來的舊觀念。這也會是個人的奮鬥——我的日子到底應該怎麼過？我要如何教導子女怎樣的生活才是好的？我如何養活家庭？此外，這也會帶來社會衝突——我們應該如何對超級富裕的人課

稅？政府對於二十年來大半時候都沒有增加收入的中產階級虧欠了什麼？先進經濟體的居民對於想要追求更好生活的移民，或對於想要將產品與服務賣給富裕消費者的窮國，應該有多歡迎？〔同樣的，這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對於富國轉向孤立主義或民族主義（**nationalist**）應該多消極地接受？〕如果我們無法讓孩子在工作裡找到意義和認同，要如何將他們的精力導向其他健康的選擇，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或社會虛無主義（**social nihilism**）？

我們已經看到極端民粹的候選人責怪移民，還愈來愈受到歡迎。在法國，由勒龐領導的反移民、反親歐派的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正危險地悄悄接近法國總統的位子。匈牙利首相奧班（**Viktor Orbán**）雖有專制傾向，卻因為訴諸匈牙利民族主義而能維持人氣。在美國，川普提出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惡毒煽動性言論為政見，爭取在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各個富裕國家的民族主義右派都是聲勢看漲。

較激進的左派也是。但這新左派在選舉成績上還不像激進右派那樣成功。極左派的柯賓（**Jeremy Corbyn**）掌控英國工黨，震撼英國當局，但他還未能從保守黨奪下政權。來自佛蒙特的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長期的社會主義者，爭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對希拉蕊形成讓人驚訝的巨大威脅，但終究未能達陣。有些激進的左派政黨表現好一些，例如希臘反撙節的左派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party**），他們在二〇一五年初贏得議會掌控權，嘗試爭取歐洲債權人要求的撙節政策暫時緩解（那些債權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協助希臘支付無力負擔的債務）。

左右派的激進運動目前訂定的目標都相對溫和。歐洲一些右派致力爭取擴大國家主權（或甚至要退出歐盟），以及更嚴格地控管移民。他們還未對自由主義和民主展開大規模攻擊——雖然這是有可能的。同時有些左派主張終結撙節政策，有些力主擴大福利制度。桑德斯的競選主張是大專免學費，創造單一保險人支付健康制度（**single-pay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他們還未提出嚴苛的稅金以及將生產工具國家化的政見。

兩種政治極端可能永遠不會有機會追求他們的目標直到合理的結果。但激進主義將在全球政治舞台成為愈來愈真實與強大的力量——直到政府開始回應數位革命引發的艱難問題。當人們感到不滿和疏離，便會繼續要求更好的待遇。接著會發生激烈的觀念與意識形態之爭，激進派會從保守菁英份子手中奪取權力的操控桿，將他們的理念付諸實踐——不論結果更好或更壞。

雖然聽起來很不祥，稍微讓人安心的是，我們知道以前都已經歷過這些了。工業革命也是以類似的方式破壞舊有的社會秩序——消滅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以機器取代勞工，擴大貧富不均，導致過去很強大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被邊緣化。然後激進的新政治運動趁勢而起：包括工會；進步的社會活動（追求擴大選舉權、教育投資、禁

酒及其他各種目標)；激進的意識形態(如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經過這些團體之間的政治與社會競賽，終究促使人們對國家以及國家應在個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產生新的觀念。現在我們認為國家理應扮演廣泛的社會角色——包括普及教育、為窮人與失業者提供公共醫療衛生和財務支援、提供慷慨的退休金、興建與維護基礎設施網——這些在工業革命之前是無法想像的。

讓人擔憂的當然是整個世界從A走到B的過程中幾乎四分五裂。從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很多富裕國家都經常在革命的威脅之下。政府費力地要馴服愈來愈可怕的金銀與商業循環——這類循環往往在橫掃過進步經濟體的過程中摧毀了人民的生計和儲備金。一些國家發動昂貴到不可想像的激烈戰爭，最後演變成從一九三九年開始的意識形態大戰，造成數千萬人喪命。那場戰爭又促成一些國家發展出威脅人類存續的武器，可以說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這場戰爭才算真正結束。通往繁榮的道路漫長而殘酷。

但在路的盡頭確實可以看到繁榮——至少對世界上很多人而言是如此。百年前——當世界已進入工業革命超過百年——工業革命的很多益處還未觸及我的曾祖父，南維吉尼亞州一個辛苦而貧窮的鐵匠。當時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二十世紀前十年依通膨調整後的每人收入超越英國)，但很多地方仍然沒有水電，很多人的收入與中世紀的歐洲勞工差不多。我不確定我的曾祖是否會相信，不過八十年後，他的兒孫與曾孫享受的生活水準會讓古代的帝王艷羨(對二十世紀末的美國中產階級而言卻是再尋常不過)——可以在空調的住家坐在沙發上觀看大型彩色電視，車庫裡有兩輛車，食品儲藏櫃裝得滿滿的，冰箱裡塞滿冷飲。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這麼多人像這個時期這麼富裕。

但不可避免的事終將發生。在我們到達C點之前——亦即世人能廣泛和平地共享數位革命的益處之前——可以預期會遇到困難。事實上困難已經發生了。

關於數位經濟裡的工作發展已有很多人討論——見諸嚴肅的雜誌(包括但當然不限於我的雇主《經濟學人》)以及愈來愈重要的書籍。二〇一一年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和麥克費(Andrew McAfee)發表《和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清楚詳細地解釋聰明的軟體和機器人將有多麼驚人的進步，從那之後人們愈來愈強力而頻繁地表達憂慮和揣測。福特(Martin Ford)二〇一五年出版《被科技威脅的未來》(Rise of the Robots)，描述後工作時代的前景。他和其他作者認為，機器人和機器智能將創造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世界，必須採取某種技術社會主義(techno-socialism)才能讓社會維持順利運作。前面提到經濟學家皮凱提的大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書中提出貧富不均的大膽理論，預測將出現種種問題。海斯(Chris Hayes)的著作《菁英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Elites)，精闢解析面對最近的經濟變局，菁英制度與技術官僚是如何的力有未逮，讓人失去信心。